

王跃文 / 著

人事 故事



王跃文描写的官员形象活灵活现，揭示官场争斗入木三分。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

他写的官场气氛很足，很真切，很到位，那虚实和倾轧争斗，在那谈笑间和饕餮之中我似乎听见拳脚往来的拼杀声。小说有愤激有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几分无奈。

——著名文学批评家 张韧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
国
反
腐
小
说
大
系

人 事 故 事

目 录

Ren Shi Gu Shi

编个故事 [1]

人事 [38]

无头无尾的故事 [71]

也算爱情 [94]

花花 [126]

望发老汉的家事 [136]

雾失故园 [159]

冬日美丽 [185]

人 故 事

目 录

Ren Shi Gu Shi

漫 天 芦 花

[
1
9
8]

很 想 潇 洒

[
2
4
6]

平 常 日 子

[
2
7
2]

头 发 的 故 事

[
2
9
1]

棕 红 色 皮 鞋

[
2
9
7]

天 气 不 好

[
3
0
2]

明 天 见 报

[
3
1
9]

编个故事

编个故事

满世界都是贼。不到一年，连丢了四辆单车。都是新单车，差不多合三个月工资了。我虽说没干什么大事，可也总得成天在办公室泡着呀？都是为贼干了！单车停在别处丢了，还想得通。可我的单车不是停在马路上，也不是停在普通居民区，而是停在省政府院子里面。省政府也成了贼窝子了，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也就不敢再买新单车了，买辆旧的吧。

省政府大门出去不远，立交桥下，就有许多旧单车买。都知道那是贼偷来的，你哪天从贼手上买回自己的单车也说不定。可就是没人管这事。如今天下大事多着哩，谁还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收光洋，江洋大盗抢银行。那才是大事！

几分钟就到立交桥下了。桥下是拥挤的成衣门面，还有地摊。成衣门面是市政部门出租的，地摊是打游击的。打游击的小贩们，就像我小时候见到的麻雀，在晒场里一跳一跳地，偷吃谷子，眼睛却四处张望。一旦来人，轰地飞走。真的就叫作鸟兽散。

我正转悠着，就有位既不像鸟也不像兽，反正形象没法形容的

男人走近我，问：“你是想要单车吗？”

“是的。”我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跳猛然加快了，倒像我成了贼似的。我故作镇定，背起手来，不屑地瞟他一眼，再朝别处看，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想要几成新的？”那人又问。

我并不马上作答，瞟了那排单车，轻吞吞说：“单车要好点儿的，价钱不能太贵。”

那人说：“一分钱一分货。”

我便望着他，似笑非笑的，说：“你们这种车也说一分钱一分货？”

那人嘿嘿一笑，不说什么，过去推了一辆车过来：“你看看吧。”

我还没及细看这车，听到有个浑厚的男声在念报纸，忍不住回过头去。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关方面近日达成一项协议，决定重新开放被关闭的加沙国际机场。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根据这一协议，巴勒斯坦方面承诺将严格遵守双方有关加沙机场管理协议，禁止巴武装人员进入机场，以确保以方工作人员安全……”

人来人往的，一时不知这声音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很有磁性，且很具穿透性，听得耳膜发震。就像是喇叭里的声音。终于发现桥下拐弯处，一个男人坐在地上，满脸油污，手中拿着半张报纸。我想肯定是疯子吧。见过很多狂想症患者，以为自己是大歌星，成天在大街上载歌载舞。以为自己是播音员的疯子，倒是头一次见到。

“一百五，行吗？”那人问。

这实在是辆好车，起码八成新。一百五，太便宜了。可我不想出这么多：“最多一百。”那人说：“你开玩笑，就算是废铁，也值百把块。”

编个故事

我本来就不会还价，便说：“你也别说一百五了。你让一点，我加一点。”

那人说：“一百三，一分也不少了。”

我说：“一百二。”

“硬要一百三。”那人不肯让。

“一百三太贵了。”我说。

那人说：“一百三还嫌贵？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说：“最多加五块钱，一百二十五。”

那人立马作豪爽状：“好吧好吧，一百二十八，大吉大利。”

我摇摇头：“好吧，算你行。”

我给了他一百三十块钱，他掏了半天口袋，弄得我伸着手很不好意思了，他才说：“对不起，对不起，没零钱找你。”

我就不好太认真了，很不自然地缩回了手。“算了吧，算了吧。”只是觉得滑稽，讨价还价半天，还了两块钱，还是白还了。

“你得换把锁。”那人说。

我想这人还不错，知道提醒我换锁。不然，他只消派人跟着我，看我把单车停在哪里，等我一转身，车就又是他们的了。我推了单车，边走边看，想找个修单车的地方。

“加沙国际机场是巴勒斯坦体现国家主权的唯一口岸，但机场安全和出入境管理依然由以方负责。”

我循着念报声望去，却见那黑脸男人面前摊着些工具，身后是些废旧轮胎。原来这是个修单车的师傅。

“师傅，换把锁多少钱？”我问。

师傅抬眼望着我：“看你要什么锁。这有种最好的锁，新产品，叫奈我何，没法撬开，得用锯子锯。三十块一把。也有十几块的。”依然是念报的那种腔调，声音高昂。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位师傅还戴着眼镜，头发往后梳着，有些秃

顶,俨然知识分子。只是脸上的油污多了些。“一把锁就得三十块,单车才多少钱?”我说。

师傅说:“有便宜的啊。”中气实足,简直像在演话剧。

“还是换把三十的吧。”我想单车虽是只花了百多块,丢了也难得再去买。

师傅替我卸下旧锁的时候,我猛然间觉得这分明是别人的单车。感觉就是我自己在偷车,莫名地紧张起来。忽又担心这是个圈套:如果突然钻出个人来说这是他的单车,我就哑口无言了。白送一百三十块钱不说,还会被人当贼看。

师傅手里忙着,嘴巴却没停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兵种党委……”

我印象当中,“文革”时候,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听人这么念文件。那会儿我还小,坐在妈妈膝上,经常听人这么念着,觉得很好玩。我便想这师傅也许有点毛病了。这会儿他嘴里说的,就不是当今报刊上的东西了,全是“文革”时的内容。我回头四处看看,不见什么动静,心想只怕没事了。

“师傅你记性真好。”我说。

师傅说:“我不光记性好,脑瓜子也活,声音也好。”

“声音的确好。”我说。

师傅说:“论脑瓜子,叫我当省长都嫌委屈了;论声音,赵忠祥肯定比不上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动员他去做总理吧,只道:“那是,那是。”

“先生是位教师吧?”师傅突然问我。

“师傅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教师了呢?”我不说自己是省政府干部。记得有回在火车上,我说自己在省政府工作,所有人的目光都奇怪起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这年头当干部原来是件丑事。从那

编个故事

以后，在陌生人面前，我都说自己没工作，到处混饭吃的。

师傅说：“我虽说是小手艺讨吃，也算是坐码头。别的本事没有，就会看人。看你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八成就是教师了。”

我玩笑说：“我的眼镜片儿还没你的厚，那么你就肯定是大学教授了。”

师傅说：“不是跟你老弟吹，要说学问，我也并不比哪位教授差。”

我说：“看得出，看得出。”

师傅说：“这世道，学问有什么用？老弟，我看书是过目不忘。不信，可以打赌。两三千字的文章，我读两遍，就可背下来。报纸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我读五遍，就可以背下来。”

我嘿嘿笑着，付了他钱。锁换好了。我想这位师傅肯定是疯子无疑了。师傅却以为我不信他，捡起地上那半张报纸，说：“这报纸是我刚才捡的，你随便点篇文章试试！”

我看看时间，还早，又觉得挺好玩的，就点了篇头版文章，说：“这篇文章大概两千字，你要读几遍？”

师傅接过一看，说：“头版文章得读三遍。你不知道，报纸上的文章，要数头版头条最没味道。要是依我制定法律，谁犯了法，就罚他读头版头条，一天读一百遍。”

听说他要读三遍，我就有些急了，直想小便。这时，我瞟见不远处的地上摆着些书，好像有几本是我的大作，当然是盗版的。我想过去看看。可师傅却在字正腔圆地读着头版头条，我不敢挪动半步。这师傅的普通话也少有的地道。一个南方人，居然有如此好的普通话！还是个疯子！谁愿意听别人读三遍头版头条文章呢？除非他有毛病。可师傅读了起来，我只得听着。看来是我有毛病了。师傅越是这么认真，我越是相信他是疯子，就越不敢走了。惹谁都行，就是别惹疯子。

果然就看见不光是我不敢惹疯子，还有人人都怕的人也怕疯子。师傅正高声朗读着头版头条，忽然听得一阵乱哄哄的尖叫声，有很多人飞也似的跑，像是突然发洪水了。我半天才反映过来，原来是城管队的来了。我回头再看看那卖盗版书的，早不见踪影了。城管队的穿草黄色制衣，戴米色头盔，手里一律操着橡胶头的那种警棍。听说那橡胶里面包着金属，打起人来不见外伤，专致内伤。我想这警棍肯定是哪位心地阴毒的小人设计的。

小贩们逃之夭夭，只有这位读报的师傅岿然不动，仍在那里抑扬顿挫着。我见有位城管队员想上前来说说，另一位拉拉他的袖子。那些米黄色头盔们瞪了几眼师傅，上车走了。

师傅突然停下不读了，嘻嘻笑着说起了一一个早就传遍了大江南北的顺口溜：“一等警察交警队，车没停稳先收费；二等警察刑警队，案子没破先喝醉；三等警察治安队，赶走嫖客自己睡；四等警察城管队，本身就是黑社会。”

师傅的声音太洪亮了，就像高音喇叭。听着的人们，先是一遍寂静，继而就大笑起来。有人说，过瘾过瘾，听着过瘾。

“再来一个！”有人叫喊起来。

师傅不理睬，仍旧读报。有人不耐烦了：“师傅，拜托你别念了好不好？谁听这种文章？你又不是政府干部！”

师傅说：“这位小老弟考我，是他点的文章。”

“这位莫不是政府干部？”

“看样子像。戴着副眼镜，像！”

“像，现在干部，都是知识分子。”

“对对，现在干部，多是四只眼睛的。”

“哪是四只眼睛？没眼睛。你们不知道省字是怎么写的？省为少目，就是没长眼睛。省政府也就是没长眼睛的政府。”

“政府真长眼睛就好了，老百姓这么难，谁看见了？”

编个故事

我笑着说：“拜托了，我幸好不是省政府干部，我同你们一样，自己混饭吃的。”

可我的声音太小了，没人听见。师傅忙说：“这位是老师，哪是政府干部？我同他玩玩。是政府干部，孙子才同他玩哩！”

这时，师傅将报纸递给我：“你看着吧，我开始了。”

我这回就真的像一位老师了，在检查学生背书。天哪！师傅竟然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居然有声有色，就像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过往的行人也都往这边张望，觉得好玩。那些充耳不闻的行人，大概以为是哪里的喇叭在叫，当然不值得理会。附近门面的老板们却没有什么反映，他们也许听多了。

从那以后，我便经常跑去同师傅闲聊。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疯子，却是个很好玩的疯子。同他玩玩，没危险。我因为写了些不讨人喜欢的小说，已成了事实上的流亡作家。不过是软流亡。他们没让我去西伯利亚，也没让我去伊犁或是沧州，只是让我呆在办公室里。天天看报喝茶，工资月月照拿，就是不让我做事。

我有个坏毛病，就是必须回到自己的书房，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而且必须打开电脑，才能进入创作状态。要不然，在办公室里反正无事可干，写写小说多好！可是，我实在不能在八小时之内创作。哪怕就是坐在那里构思一下小说情节都不行。便只好看报。当然是从报屁股看起，往前面翻，翻到令人头大的大块头文章，就不看了。然后就是枯坐，什么也不想，大脑一片空白。有时会突然想起出去走走，碰上师傅在那里，就同他聊几句。师傅总会问：“下课了？”

我应道：“对，下课了。”

经常这么回答，就觉出了个中的幽默。时下老板炒人鱿鱼，都说让你下课。我知道，我若仍是这样写小说，只要有机会，他们就

会让我下课的。

这天上午，我正在看报喝茶，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一篇随笔，被《杂文选刊》选载了。他说记不起文章题目了。我知道就是前不久发的那篇《中国天天感恩节》。我有很多这种粗心的朋友，比如总把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说成是《庭院深深》，把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说成是《官场现形记》。我还没收到《杂文选刊》样刊，便想去买本看看。反正想出去走走。

我不用同谁打招呼，就出去了。没人在意我在不在办公室，也不会有人找我。无非是朋友的电话，也误不了事。他们要找我，挖地三尺都要找着我的。找着我了，是他们的福气；没让他们找着，就是我的福气了。我爱我的朋友们，但就是怕同他们喝酒，怕听他们的太过夸张的表扬。

去邮局门市部买了本《杂文选刊》，低头匆匆出来了，逃也似的。这邮局书刊门市部，我是爱恨交加。我很喜欢来这里买书买报，他们的书报来得快。但几乎每一家邮局书刊门市部，都有我的盗版书。最近到外省转了转，凡是在机场书店和邮局书店见到的自己的书，全是盗版。我总是侧着身子，斜着眼睛瞟一瞟，倒像我成了贼。

我手中拿着杂志，就像冒充学问人的那类，在街上转了一圈，就往立交桥去。见师傅正在念着一张商品房广告：“梦园居家，现代理念。欧式别墅风格，中式园林小区……”

“在做广告哪！”我说。

师傅嘿嘿一笑：“没事无聊，见字就念念。下课了？”

“还没下课哩。”我是想着自己仍还在政府呆着。

师傅问：“没下课，老师怎么出来了？老师也吊儿啷当了？”

感觉谁都可以吊儿啷当，就老师就得中规中矩。我说：“让学生自习哩。”

编个故事

师傅笑道：“那就是你老师偷懒了。要是政府也像你一样，少管点闲事，让老百姓自习，那就好了。”

我问：“师傅你怎么老讲政府坏话？”

师傅笑而不答，只说：“你想告密？”

我也笑笑，岔开话题：“师傅，你的记性怎么会那么好？我让学生背书，就像杀猪似的。”

师傅脸色就不好起来：“你是不相信我吗？你可是考过的哩。”

我说：“你记性好，我承认。但不相信你就那么看几篇，就可以背下来。那回那半张报纸，是不是你事先都背下了的呢？”

师傅就真的生气了：“可从来没人这么不相信我的。”

我说：“师傅别急，我看你很好玩，就老想找你玩。我是想取经哩，好教学生。我手头有本新杂志，我随便点篇文章，你马上背下来，我就真服你了。”

师傅说：“这就算打赌了。我若背不下来，请你吃盒饭。我要是背下来了，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请你下馆子。”

师傅摇摇头：“别这么客气，馆子就不下了，你也买碗盒饭算了。”

我说好吧。自然就点了那篇《中国天天感恩节》。师傅只念了几行，就点头说：“好文章，好文章。”我暗自得意起来。头一次听别人读自己的文章，感觉很新鲜。师傅大概不习惯默读，便高声念着。其实我是相信师傅的背书绝活的，只是想听他读读我的文章。觉得好玩。

师傅只读了两遍，就噼里叭啦地背起来了。自己的文章总能记个大概，我便没有看书，眼睁睁望着师傅。真是神奇。我相信自己是碰上民间高人了，尽管他满口疯话。要是谁不服气，我将自己的大作抄录如下，你也试试。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

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芙蓉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了，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便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

编个故事

何其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而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的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你不知道被人家收回过去的原本是你自己的，便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其实这无非就是多

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待见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是很迂腐可笑的。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官官感恩，自有道理。毕竟官员之间互利互惠，今天你感谢我，明天我感谢你。可是老百姓从来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却偏偏一直莫名其妙地要去感谢别人！看电视新闻，感觉就是天天在过中国式的感恩节。只要看见群众在官员面前作揖打拱不迭，我就反胃。此类新闻是怎么操作出来的我并不陌生，本不值得当真计较。奇怪的是在那些导演出来的新闻场景里，官员们那么心安理得、处之泰然，似乎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广布福音的救世主。他们好像全然不知自己恰恰是百姓养活的，百姓才是恩人。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编个故事

听师傅背完文章，正好也是中饭时间了。我双手抱拳：“师傅，真的服了，真的服了。别客气，我一定要请你下馆子。”

师傅推脱再三，硬说只吃盒饭。我死活不依，一定要请他下馆子。师傅拗我不过，就跟我下馆子去了。

我俩找了家不算高档，却也干净的店子。服务小姐见师傅这模样，都奇怪地看他。他却如入无人之境，不显一丝窘相。师傅居然还很能喝酒。几杯白酒下肚，他的话更是多了。只是听着听着就像疯话。哪怕是闲聊，他也是高声大气，弄得整个大堂的客人都朝这边看。

听他说着疯话，我却只好一本正经，说尽好话。我的声音不大，他一说话就响彻整个店子。外人听来，就不像我俩在交谈了，而是他一个人在独白。感觉自然是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那有多滑稽！

我说：“师傅，你这么好的记性，这么好的口才，不如去考个律师。律师得记很多法律条文，你最拿手。那可挣大钱呀！”

师傅说：“律师证，我有啊。打官司，我的名气大着哩。”

我望望他的眼神，竟看不出他是不是在吹大牛。我不敢说他既然有律师证，为什么还在这里修单车，只道：“是吗？我孤陋寡闻，对法律界知名人士不了解。再说，我也是大大的良民，也用不着律师哩。”

“当年，我可是打过很多有名的大官司啊！那年，有位明星吃了官司，就是请我做律师。在法庭上，我可是舌战群儒啊……”师傅目光迷离起来，真有些回首往事的意思。

“啊，是吗？”我只好随便应着，不便细问。

师傅喝醉了，东倒西歪地回到立交桥下。见他倒头就打瞌睡，

我无所适从。旁边一位生意人见了，说：“没关系的，他是神仙，没事的。”我便走了。

我中午便有些睡不着，觉得自己真是碰着奇人了。疯子同天才的确只是差着一丝头发啊。我想，论师傅的口才和堂堂相貌，若让他当个干部，只怕不会比别人差。

似睡非睡地躺到下午上班时间，突然不想去办公室。我想劳动纪律是为劳动服务的，既然不让我劳动了，我还要那纪律干吗？便想起床写小说。心想写写这师傅也许很有意思。我也是该写写别的小说了，好让我的读者朋友们换换胃口。可我手头正写着一个长篇小说，出版社老在催稿。

打开电脑，却不想写这长篇，直想写点别的。师傅肯定很有写头，可我对他毕竟不太熟悉。不如让他到我熟悉的生活空间里走走？当我萌发这个念头时，不禁有些激动。我是一激动就想上厕所的，便跑去卫生间大便。蹲了一会儿，小说梗概就有个眉目了。小说就是好玩，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只要有人愿看就得。而且我这么编，也不用担心有人对号入座。明知道我在写个疯子当干部，他也就不好认账了。

那么从现在开始，师傅就是干部了。我还从未打听过他的尊姓大名，就让他姓师算了吧。百家姓中好像也有姓师的。那么这位师干部该干什么工作好呢？凭他的才能，多大的官都能当。当官重要的是口才，师干部偏偏能说。他若有幸是个美国人，只怕连总统都能当上。想当美国总统，首先就得擅长演讲。有人说美国政治就是演讲政治。

我想师傅对干部的感觉，八成是从城管队那里来的，就先让他从城管队干起。只要干得好，我就提拔他。

话说师干部当了城管队员后，恰好碰上市里的首次文明执法月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月之内，城管队不得满街掀摊子，不得